

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

——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之一

陆建华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是青年问题越来越突出，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密切关注。这10年期间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各种变化，在青年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显现了极强烈的独特性；而且，青年问题本身也开始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变革进程的独立的社会因素。建国40年以来，只是到了80年代，青年问题才第一次全面而猛烈地爆发出来。因此，青年问题在80年代的起源、发展、社会后果以及对中国青年未来的发展，不能不是一个极有理论探究意义的主题。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理解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特征，或者从青年生活方式变化角度入手，或者从青年观念演变角度着眼，或者重点探讨青年文化的基本倾向。笔者认为，若着眼于80年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着眼于青年与社会的全新关系的形成，把握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理论意义。

80年代史称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时期，宏观的社会管理、控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人们的主体性的行为、观念也呈现出动荡不居的特征。能够同时引起社会的宏观与微观层面、主体与客体方面以及社会与个人意义的一系列变化的改革，必定是一种制度性变革，因为在所有类型社会建制里，唯有社会制度不仅是社会的结构和过程规则的体现，而且也是规范个体、团体行为的各种准则的结合体；还是一定社会文化价值的产物。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制度性变革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80年代中国的制度改革（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改革）的确是社会生活各层面发生变化的重要源泉，同样，它对青年问题的起源、演变及其特征形成一种强烈的规定性影响。

这里所说的制度，不是指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层次上的社会形态类型，而是指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特定的准则、规范、机构和组织及其运行的体系，也叫体制。这种体系的实质是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定和约制，它通过一系列准则、机构活动来实施其社会管理、制约的功能。社会对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对青年的期望、对青年发展趋势的规定、对青年形象的塑造，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理解，比如，从文化传统角度来理解，从物质生产活动方面来理解，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理解，我认为，要把握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实质，唯有从制度背景方面来理解它，来理解社会对青年所施加的全部影响和途径，因为，第一，80年代中国的制度改革是一切社会生活变化的核心，这种改革已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第二，社会制度对青年问题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对青年整体的社会行为层次方面，而正是这种行为的结果构成了青年问题本身。

制度背景的理论含义

社会制度既是社会秩序的象征，又是社会运行的保证。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社会制度无所不在，而且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功能。正是这种普遍性和重要性，使我们能够从制度背景出发来衡量青年社会行为的特点、确定青年问题的意义和界限。青年问题并不是在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关注的中心。当青年的社会行为总体上与社会制度及其规范相符合的时候，青年问题就不会很突出，比如50年代中国社会就是如此。若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分析青年问题本身的结构特点的话，就可以发现，它与社会制度类型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当青年的某种社会行为与相应的社会制度不相符合，而且其后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时，青年问题就萌生了。反之，青年的某种社会行为可能并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意味着社会制度可能有效地解决了某种青年问题——第一，使其社会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撇开社会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不谈，可以认定，青年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偏离制度的社会行为的结果；第二，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完全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有效性，而青年问题所表明的青年社会行为的合理性，则必须通过对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现实考察来加以评判。

青年问题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社会事实，青年问题是青年的社会行为的直接后果。青年不仅是一个年龄群体概念，因为属于青年这一年龄段上的人们社会行为的独特性，被人们反过来赋予青年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即社会行为内容。然而，青年社会行为的独特性本身并不是青年问题，而只有把这种独特性与社会制度及其体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过程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作出青年问题是否存在的判断，处在青年期的人们占据着特殊的社会地位、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角色、面临着特殊的社会任务，然而，其行为规范和准则乃至价值取向最终还是由社会制度体现出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青年与社会之间内在联系集中反映在它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上。社会制度的变化，必然伴随着青年的社会行为的变化。当这种行为冲破了既有制度的约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时，青年问题就发生了。所以说，青年问题存在本身就体现了对既存社会制度的疑问和挑战；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回答疑问、接受挑战、能否消解青年问题的消极后果，使青年的合理社会行为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全面的制度化保证。于是，任何时候的制度改革本质上都有利于青年问题的解决。80年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这需要进行广泛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

我认为，从社会制度角度出发，可以把青年问题划分为三类：

1. 典型的制度问题。

这类问题意味着青年的某些社会行为的后果与既存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前者受到后者的明确的保证。当这种关系遭到破坏时（不管是青年的社会行为引起的，还是社会制度引起的），就会发生青年问题。这类问题涉及青年的四个重要的社会行动领域：升学、求偶成家、择业、政治参与；与这些领域直接对应的社会制度分别为：教育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政治制度。一般说来，这些制度的合理而正常的运行将能保证青年的有关社会行动的正常进行，从而完成特定的社会任务（学习知识、成家、从事职业活动和参与政治活动），发挥合格社会成员应有的社会作用，在特定年龄段上的人们同时面临相同的社会任务，这是人类生活运行和发展的需要所致。这意味着必须有一系列相应

的社会制度来加以保证。人们可以用青年的社会行为特征来理解青年问题的实质，比如，在我国，绝大部分青年在18岁时就面临就业这一重要的社会任务，而青年的职业意愿的培养、职业选择指导、职业技术培训、职业流动的进行等一系列活动，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制度来加以保证，使之依循必要的准则和规范，得以顺利进行。若就业制度发生故障时，青年的就业活动便无法顺利进行，其社会后果就会令人瞩目起来。这就出现了典型的制度性青年问题。

在青年的历史进程中，制度性青年问题几乎屡屡不绝。这可能表明社会与青年的关系的合理调节是一种历史性的尝试过程，最普遍的问题是青年就业问题。青年在经验、技能诸方面无法与成年人竞争，他们首先成为失业大军的当然成员。这一结果则主要是就业制度引起的。在有些国家的就业制度下，社会的充分就业是以牺牲青年的正常就业为前提的。另一个重要的青年问题是升学，在不发达国家里，教育经费数额、教育设施、就业机会等现实状况，都不利于青年正常升学、完成必要的学习任务。这典型地反映了社会教育制度的弊端：第一，处在就学年龄段上的青年得不到应有的就学机会，无法掌握作为一名合格社会成员必须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第二，极少数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青年因为对学生的社会地位的感受、因为各种思潮的熏染、因为有机会聚在一起而交流各自的思想见解，而总是形成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相互的理解，甚至成为潜在的政府反对派，一旦付诸行动，就会对社会秩序（且不谈其合理性）的稳定产生强大冲击力。另外，在许多国家，许多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岗位，甚至成为失业者，这也反映了社会就业制度的弊端，因为正是那种制度不能保证大学生求职这样的合理的社会行为。至于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对青年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更是典型。有时候，青年本身的行为是以对既定制度的否定面貌出现的，比如试婚、未婚同居、情人时尚等，这难以区分是由社会制度所致还是由青年的行为引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青年自身的行为选择，那么，就反映了他们对既有制度的不满，这就从制度权威的角度反映了某些制度本身缺乏感染力或存在某些缺陷与不合理性。

应该指出，我们不能先验地把社会制度对青年的社会行为的规范和规范过程理想化。真实的青年行为对社会制度的偏离，是处在这一年龄段的群体具有的特殊行为的集中反映。若这种偏离超出一定限度，并引起一定的社会后果，则将构成青年问题了。

2. 隐性制度问题。指那些与社会制度并不直接对应的青年的独特社会行为及其后果，它包括五大方面的问题：性、代际关系、社会化、个性发展和文化创造。这类问题通常不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对应，而与一系列制度或制度依据的规范、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把它称为隐性制度问题。人们不习惯把它称为青年问题，因为它还涉及到其他年龄段上的群体。实际上，它在青年这一年龄段上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就性问题而言，涉及到青年性意识的萌芽、性行为尝试、性意义的理解和性伦理的把握，所有这一切都体现青年对既存社会文化规范和观念的继承或创新。无论就青年个体还是就青年整体而言，性从来就是一个具有广泛而深刻社会影响的问题；一些相关的制度（比如，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教育制度）在规范青年的性行为方面应当起重要作用，同样，社会文化传统和观念的制约性也不容忽视。在80年代，我国青年那里性愚昧和性放纵同时并存，这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青年问题。个别青年的性愚昧或性放纵固然构不成相当的社会影响，而事实是这两种相对立的现象在中国青年中普遍存在。这需要从青年性问题本身入手去把握其制度或文化背景。代际关系问题同样是一个重大的隐性制度问题，但人们宁可从两代人的文化隔阂来寻找原因。这无法解释80年代中国的代际关系问题的实质。只要稍微深入分析一下，在代际关系方面，所谓代沟问题的出

现，实际上是得到一系列制度的保证的，只是这些制度并不与青年对成年的特殊观念、特殊反应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比如，造成代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不平等，青年经济地位低下、成年经济条件优裕这一事实恰恰是现行的社会生产制度、分配制度乃至教育制度的产物。除了青年需要掌握知识和技能这一特点之外，青年不被允许通过制度性渠道来提高自己的收入，这就象因为经验不足，西方少年不被允许单独开车但不能限制他拥有汽车一样，然而，是否拥有汽车，又与社会等级制度、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80年代中国青年个体户的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能消除代沟，因为代沟的起因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差异。

青年个性发展也是一个突出的隐性制度问题。从个体生命历程来看，青年期是形成、塑造个性的关键阶段，其中充满了各种偶然性。青年一代能否在这一时期发展起健康的、富有创造意义的个性，就决不是一个偶然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这其中制度因素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首先，可以从一个社会的社会化制度中寻求青年个性发展的起点。社会化制度及其活动是在激励、保证青年的个性发展还是在压抑这种发展呢？社会教育制度和家庭制度的实质能提供答案。就青年本身而言，个性发展过程总是一个探索过程，合理成份和不合理成份溶合在一起，难以分辨，关键在于既有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能否合理地引导和塑造青年的个性。合理性标志有两个：一是社会发展的前景，一是青年对自身的个性发展和文化创造活动的满意程度。同样，这两方面都必须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保证。在这方面，社会制度的功能演进的轨迹就在青年问题上活生生地显现出来。

3. 反制度性问题。指的是青年的越轨行为及其社会后果，比如犯罪、自杀、过失、离家、骚动等。青年的这类行为引起的社会后果主要是反制度性的，而且对他们本身来说，属非常规的行为类型。第一，这类问题往往是对既有制度越轨的结果，有时甚至与既有制度发生强烈对抗；第二，它也可能是由于行为主体过分遵从既有制度的某些规范而产生的结果。这就说明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弊端，或各种制度之间缺乏协调。在社会变革时期，第二种情况更为常见，因为新旧制度的交替使青年很难作出依从或不依从某种社会制度的自主性选择，相反，制度本身却以其特有的规范力量来制约青年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制度性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源于制度本身。青年越轨者的行为是其相应的思想意识的外化，这表明，社会对青年的是非标准观念的教育或引导没有获得效果，这样，越轨者的数量规模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能依此来判定制度是否存在着弊端。再比如，在美国社会，关于“成功”的社会价值目标被广为传播，也为青年所接受；但在现实生活里，获得成功的途径往往不是制度化的合法途径，甚至依从制度规范者根本无法实现成功目标而显出深刻的迷惘。那一系列制度（职业制度、分配制度、奖励制度、消费制度，等等）实际上无时不在鼓励青年运用偏离制度的手段来实现成功的梦想，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越轨行为，比如黑社会组织活动、智能犯罪，从而造成严重的青年犯罪问题。

青年的过失性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越轨者在作出某种行为抉择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必然有所收获，而这种收获可以经由既存的制度来认可，也可以不需要这种认可；制度规范在相当部分人眼里变得微不足道，只能说明制度本身的弊端，即已有的制度可能没有为青年健康地实现个性、实现创造力的发挥、实现成功目标提供合理的机遇和途径。这样，相当部分青年寻求已有制度规范之外的评价标准，就成为一种主动的抉择。青年的过失行为和犯罪浪潮就不可避免了。就自杀而论，在一定时期里，青年自杀的原因往往具有共通性，近年来，我国农村女青年自杀行为总是源于婚姻问题或情绪

无聊问题。这说明,既有的婚姻制度并不能为她们的婚姻幸福的获得提供起码的保证,择偶的限制、彩礼的束缚、父母的干涉以及经济生活水平的低下,都构成了既有婚姻制度的现实。总而言之,反制度性青年问题是极其普遍的,其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反制度化的程度(在青年的犯罪行为与弃学行为之间,没有实质差别),而在于它表明,某种社会制度因素是青年问题的重要根由——青年个体行为与社会秩序(制度规范的象征)的联结点不在别处,就在制度本身。从青年个体来看,做出某种越轨抉择,是自觉意识的产物,就相当数量的青年整体而言,这种抉择可以说是“被迫的”,因为在制度和制度规范的直接、间接的制约下,他们唯有做出这类行为抉择,才能实现心目中的目标;殊不知,他们的行为对他们自身在既有社会中的进取前景、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了消解性影响。

必须指出,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体现了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因为一系列社会制度总是与相应的社会结构及结构组合背后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而制度运行实质上就是社会结构的过程性的体现,又是一种秩序的体现。社会制度发生障碍的起因和后果很少是单一性的。青年问题(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社会根源应该从那些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和确定。青年问题一旦出现,我们要把握的是其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这就是结构意义的认识启示。

无疑,青年问题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即它总是既定社会制度不协调或出现障碍的结果。青年问题从其本意上来说,就是结构性的,这可以从下列方面来把握:第一,青年问题的起源往往可以在社会结构(核心是社会制度体系)中找到。在特定历史时期,比如80年代的中国,青年问题的突出并不是指哪一类青年问题特别引人注目,而是指各种青年问题(制度性的、隐性制度性的或反制度性的)同时爆发出来,形成极其强大的社会冲击力量。各类青年问题通常存在着相互联系和渗透的关系,比如,当青年的失业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抗议活动、下层青年的颓废和频繁越轨同时出现时,真正意义的青年问题就成为社会事实,它必定反映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弊端;若仅仅出现青年离婚率上升这一事实并不构成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青年问题,而只局限于青年的婚姻与家庭关系问题,它只表明社会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存在着某种需要加以改良的地方。当各类青年问题同时出现时,进行结构性社会改革的信号就在闪闪发光,零敲碎打式的改良必然与事无补。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对青年的思想教育仅仅是解决青年问题的一种途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因为教育的功能所涉及到的,仅仅是青年问题的结构性根源的一部分(更何况还有教育本身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涉及到制度层次的根源并非单纯的思想教育所能解决的。第二,社会制度从规范层面体现了社会结构的特质。青年问题的出现往往表明,社会制度所体现的那种秩序出现了失调和紊乱、出现了运行失灵。这同样具有强烈的结构意义。60年代美国青年问题的突出,实际上喻示了美国社会的许多制度以及制度所维持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在青年一代眼中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也失去了依从的必要。更能体现结构意义的事实是,青年的这种怀疑和失望、这种离经叛道的观念,是在既存的一系列制度的规范下培养与成长起来的,这就象一种异己的力量。没有比一种制度不断繁衍自身的反对者这一事实更能说明制度弊端的严重程度了。我们不能从制度本身的历史发展的不完善性角度来解释上述现象,而只能从制度所体现的既有结构和秩序的不合理性来阐释青年问题的社会意义。毋庸置疑,由制度本身产生的青年问题必然具有广泛的、结构性的社会后果。

那么,青年作为行为主体是如何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中作出自主性抉择的呢?因为处在社会生活的特殊地位(边缘性、过渡性),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所谓自主性抉择,注定成为结

构本身运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行为的自主性实质上就是既有的制度、结构本身自主性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年并没有纯粹的自主性行为。他们进入、参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过程，无不强烈地受制于各种既存的社会制度。与成年的社会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青年的社会行为更多地具有被塑造的成分，而同时，他们的自觉、自主意识正在逐渐觉醒并支配其行为，所以总是使那种塑造变形，成为别样的东西。这被称之为青年的创造性。而实际上，在青年的自主、自觉意识的培养方面，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发生着强烈的作用。教育制度、家庭制度、生产制度、社会管理制度以及福利制度等，从各方面对青年的自主、自觉意识的基本倾向形成重大影响。很显然，被囿限在特定制度范围内的自主、自觉意识本身并不具有多大的创造性。而恰恰在这一方面，青年的社会行为总是体现出超越一定制度范围，以此来显示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这可以被理解为抉择自主性。从社会制度着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鼓励或规范青年的这种超越制度的创造性行为，则决定青年社会行为的社会后果；若不能容忍之、鼓励之或规范之，则青年就会以大量的越轨性行为来体现他们的社会存在价值，从而构成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和威胁。故而，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也体现在这种容忍、鼓励或规范方面。然而，现代社会（包括不发达社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创立，很少考虑到对青年的那种创造性行为的合理引导，所以，青年处在一种受压抑的社会地位中，他们的超越既存制度的行为只能导致那种对既存秩序产生消极影响的青年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先验地认定青年的自主抉择和创造性是青年的本意之所在，因为只要考虑一下青年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处境，只能得出结论说，青年的自主抉择和创造性本身就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这种自主抉择和创造的实现、价值的肯定，若离开了他们周围的、从各个方面规范其社会行为的一系列社会制度，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

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反映在：各类青年问题（制度性的、隐性制度性的、反制度性的）全面而不断地涌现、深化，而且还反映在：青年问题不被当作一种独立的社会问题类型予以重视；青年问题的起因和解决办法总是被诉诸思想教育。这就构成了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一方面我们着手展开大规模的社会制度改革（它为青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具有强烈制度背景的青年问题束手无策，听任其消极影响四处泛滥。

在中国，只是在被当作教育对象或生产生力军的时候，青年才被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独特的社会群体，这意味着，在制订广泛的社会政策时，青年问题从来不被当作一种重要的社会因素来加以考虑。而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国的80年代实际上是受困于青年问题的年代。青年问题的最核心表现是：在各社会生活领域中，青年的社会行为普遍地、频繁地超越既有的各种社会制度以及这些制度所体现的主流准则与观念，并产生了具有冲击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而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基调是制度改革：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就业制度……统统都被卷入改革的浪潮。这样，对既有制度的“官方”否定与来自青年的否定交织在一起；青年问题的制度性起源与制度性后果、青年问题的解决与制度改革，等等，都混淆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80年代青年的许多行为以及青年问题都具有系统的、强有力的制度背景。

1. 制度改革的前提、现实条件与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基本特征。

以经济制度改革为起点和核心，牵动了一系列社会制度的连续不断的改革。在这10年中，每一项改革措施乃至方案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后果，包括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成员的观念与行为的变化，由此构成了进一步改革的前提，激发了新的改革愿望。改革的浪头就是这样不断地涌动、前进，改革由局部而向全局、由表层而向深入。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制度改革的基本前提只能是对既有制度的合理性的怀疑或否定，重新构造社会生活的各种基本秩序及其基本准则，在改革过程中唤起公众对新秩序、新准则的渴求和肯定情绪。显然，新旧制度的交替并不能够在10年时间内完成，故而，社会秩序的动荡以及人们相应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变化不居就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根本特征，具体地说，这种动荡和变化反映在：决策和方针的变化、物质生产水平的起伏、基本价值取向的演变、人际关系模式的更新等等。我的基本判断是：首先，80年代青年问题的起因及其严重化趋势与其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体现出来的，倒不如说，它一开始就蕴含在旧有制度的弊端之中；其次，10年期间的制度改革并没有为消除青年问题的消极后果提供有效的社会保证和政策措施。这两点，构成了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的基本含义。

仔细分析一下，80年代初期青年问题的三大焦点是：青少年犯罪浪潮、青年待业问题和大学校园的政治动荡，无一不是旧有制度积弊的产物。就以青年就业问题来说，当时高中初中毕业生作为新生的劳动力直接冲击劳动力市场，大学招生制度的恢复运行吸收了一部分高中毕业生，然而，升学人数极其有限。大量的高中初中毕业生“嗷嗷待哺”，然而，时逢数百万下乡知青大返城，原来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加紧张，广泛的社会骚动和沉重的情绪压力漫遍社会。青年就业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既反映了长期僵化的单一的劳动就业制度的弊端，也反映了职业教育制度以及60年代末以后形成的上山下乡的知青就业制度、50—60年代以来的人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缺陷。上述问题在80年代以前就潜伏着，未被重视；到80年代初，巨大的现实压力逼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们，并着力加以解决。于是，多渠道就业、改革劳动用工政策等方案被提了出来，旧制度开始受到了强烈冲击。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又产生了新的青年问题，即大量未受过基本职业技能训练的不熟练工进入职业岗位，影响了劳动生产率和正常的劳动秩序。这样，教育制度特别是职业教育制度和职业培训制度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几十年形成的中等教育制度从结构上到观念上都受到冲击。为社会提供成熟的劳动力问题既成为青年个体的职业生活的重要反映，又成为影响劳动制度的效率的重要因素。到80年代末，青年就业问题是不是得到根本解决呢？很难做出如此定论，因为就业年龄的青年数量又开始剧增、农村隐性失业问题促使大批青年农民进城冲击劳动力市场、青年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愿望上升但既有制度不能使之得到满足、青年职工普遍的劳动积极性下降……等等。这一切说明青年问题根植于旧有制度的弊端，也说明制度改革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透过青年问题的现状和特点来评价已经展开的制度改革的有效性及其合理限度。

80年代青年问题显然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改革促使青年问题以空前的形式爆发出来。青年问题顽强地向社会警示：旧有制度的弊端背后，存在着社会生活内在秩序的严重失调，而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

第二，数十年时间形成的旧有制度及其弊端使青年问题积重难返，在整个80年代内难以

得到根本解决，而局部的解决努力往往引起新的青年问题。

第三，制度改革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原因很多，但从基本价值准则来看，整个社会并没有把青年问题看成是完整的、独立的、意义重大的社会现象，因为人们习惯于重视超越于社会活动主体之上的客观现实而不重视主体本身的需要及其活动特质，比如，从社会治安角度来看待青少年犯罪浪潮和越轨行为的蔓延，从纯经济角度看待青年就业问题，从理想教育或思想教育角度来看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的剧变，从道德角度来看青年的性问题，如此等等。而同时，青年被当作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教育对象（特别是思想教育），着力于从教育的立场来解决青年面临的大量的制度性难题。这种尖锐的矛盾便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在80年代，青年问题的解决得不到必要的制度保证，也缺乏起码的制度步骤。这对10年期间青年问题的演变、特点和未来趋势产生了巨大的消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青年问题的严重程度。

2. 制度改革目标、措施、实际社会后果之间的严重脱节与青年问题的激化。

80年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改革具有明显的探索、实验性质，具体表现为：制度改革的决策依据往往充满着歧义，这源于对基本国情以及社会政策的效能等问题的认识方面的极端模糊，如此，改革步骤总是缺乏关于长期效应的基本预测，也缺乏关于全局与局部之间改革关系的准确把握，所以，制度改革本身就成为需要改革的事情。一项制度改革措施可能具有的各种社会后果被简单化、片面化地理解，若干项措施的实行很容易导致无序化，因而社会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之中。实践证明，社会的长期动荡在促使旧有秩序的瓦解方面偶有成效，但在建立新制度方面则难有实绩。在动荡社会气氛之下，青年的社会行为必然变得不可捉摸：依循还是违背既有的制度呢？哪一类制度值得依循或违背呢？这类问题成为难解之谜；更严重的是，在更多的情况下，青年并不是自主地决定是抉择依循行为还是抉择违背行为，他们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支配着这样或那样，而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感到目瞪口呆、束手无策。

从青年具体社会行为来看，某一种青年问题的激化往往是相应的制度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秩序、准则、规范发生混乱的直接后果，比如，青年高消费浪潮是与社会总需求膨胀、消费量失控的状况相伴生的，而针对总需求、消费量方面问题的制度改革则缺乏具体明晰的目标与长远规划，各种配套的制度改革因为缺乏协调，难以形成综合的社会效益，难以实现改革目标。这客观上为青年高消费意识的增长和行为的实施提供了现实条件，即使采取某种手段控制了高消费行为，但青年的高消费意识却一发而难收，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并且因为难以通过制度化途径满足消费欲望，或实施非法行为，或蕴生不满情绪，或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做出消极解释。这无疑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对制度改革的推进的潜在威胁。所以说，高消费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激化了青年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加剧了青年问题，这方面典型事例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青年失学逃学问题、青年人才外流问题、青年犯罪问题……。分配不公在青年问题方面的反映相当尖锐，它反映了社会分配制度、奖励制度、工资制度、劳动分工制度、行业制度等多方面的严重弊端，青年知识分子与青年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个体户之间的收入的悬殊差距，不仅影响了各类青年的日常生活水平，而且影响他们对社会现实、自身地位与职业前景的各种认识，并促使青年的经济成功动机转换为一种激烈的、带有对抗性质的、反制度性的社会动机，从而酿成青年对物质享受水平的百般追求。在青年犯罪和越轨事例中，经济动机明显增多。从制度因素看，根本

的出路不在于是否实行收入水平拉开距离的政策，而在于是否向全体青年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经济机会并予以全面的制度保证，鼓励他们合法地争取经济成功。

大量农村青年向往城市生活、流入城市问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尽管有一系列制度来限制青年农民的行动，鼓励他们离土不离乡（比如进入乡镇企业、就地开展各种经营），但显然，农村青年的巨大生产潜力和对城市生活的高期望被低估了。另一方面，城市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从而形成了“流通渠道”，到80年代后期，青年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生产和生活秩序带来剧烈动荡；在80年代末，由于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大力压缩城市中各类农民工，大量青年农民只好重新回到农村；因为农村乡镇企业的不景气、隐性失业问题重又发生，不安和骚动又出现在农村。也就是说，我们尚未有机会充分认识青年农民进城的重要社会意义，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赶他们出城。从制度效用看，究竟是进城有利还是出城有利的问题无暇解答，因为我们穷于应付各种意料不到的、紧迫的现实压力，所有这一切都与改革目标不明确、步骤不扎实、措施不得当不协调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旧有制度的弊端与新制度的不完善之间的界限被混淆了，旧制度的复辟成为现实的可能，比如，青年出国浪潮问题很大程度是由留学生制度引起的、核心症结是对国外学生归来人员的优厚政策，无论在科研、晋升、生活条件等各方面都优于国内人员。这意在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但其实际的直接后果是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内青年千方百计地向国外流动，因为和回国人员相比，他们都处在极其不利的地位上。这种制度究竟是解决还是在激化人材外流问题呢？这种疑问常常引起一部分人重提“回到10年前的闭关状况”的主张，以为这是根治外流问题的良药。

整个80年代，一种青年问题尚未获得解决，又产生新的问题，如此以往，青年问题的涉及面越来越广、深度也越来越甚。这里，青年的社会行为同时受制于新旧两种制度，其社会后果往往不利于制度改革的深化。这只能说明，一些“新”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不高，即未能彻底克服旧制度的弊端。

3. 制度改革的曲折性与青年问题的政治性质。

80年代中国制度改革的另一特征是一波三折。就经济形势而言，就有三次重大波折。由此而来的政策、方针和措施的调整，必然产生剧烈社会后果，也必然反映在青年问题方面。

从青年主体角度看，他们的探索行为往往和制度改革的波折联在一起。关于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曾经几多曲折，从顶替到多渠道就业、到合同工制、到优化组合……这有力地规定了青年职工的行为抉择。可以说，这一制度改革的本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许多调查表明，青年职工都认定，职业活动应该成为有兴趣的、能发挥自己特长和实现人生目标的活动。上述改革很少考虑到青年职工的这类普遍而深刻的愿望，故而难以解决长期存在的青年职工劳动积极性低下的问题。由于社会主导观念总是把劳动积极性与人的政治觉悟简单地直接联系在一起而置青年的兴趣与特长的发挥于不顾，这样，青年职工的职业活动被赋予鲜明的政治色彩，其意外后果是，他们对具体的劳动制度弊端的不满被自然而然地引发到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不满上。这种不满多以冷嘲热讽的言论或冷漠的政治态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青年学生那里，情景就不一样了。他们在校园里吸收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形成对社会政治现实的超乎知觉层面的认识和判断，而且又聚集在一起，思想的汇流和情绪的感染必然走向政治行动主义。

制度改革波折对80年代青年问题的政治性质的规定，主要通过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及其社

会后果反映出来。80年代初，曾经有一段时期，青年政治激情高涨，其政治行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后，政治厌烦感和政治冷漠情绪弥漫在各类青年之中，这是对旧有政治制度（如个人独断、干部职务终身制、权力无节制以及思想僵化）不满的集中反映。80年代初以后，恢复高校招收制度以后毕业的第一第二批大学生开始从校园走向社会，全面介入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各领域，并逐渐形成新的青年知识分子阶层。这预示着，青年的政治态度决不会停留在一般意义的冷漠、不满和空泛议论层面上；政治制度改革的观念很久以来就在他们的意识中萌生；他们必然会向社会提出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问题。若这一问题得不到完满的解决，必然酿成反叛性的政治行动。这一事实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纵观80年代，政治制度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被人们认识到的同时，改革的步伐也开始启动了，比如实行党政分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等。然而，政治制度改革特别充满风险和曲折。各种政治倾向和思想观念及其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和社会后果，理应是预先就考虑到的政治因素，恰恰这一点被重视不够；人们也没有意识到，青年的政治意识被渗进了大量的情绪成份以后，必然会导致政治行为；在对待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政治不满和政治偏离倾向方面，没有采取积极方针，而实施诸如堵、压之类的消极手段，这样激化了青年的激情抑郁，导致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紧张。青年与主导政治规范、观念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青年的许多非政治行为也带有了强烈的情绪发泄特征。具有政治讽刺意味。这样，青年问题的政治意义在80年代末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一系列事实表明：

第一，已有的政治制度改革并未为青年的积极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途径。1986年夏以后掀起的政治制度改革理论探讨，曾经一度引起青年的政治热情，但那仅局限在理论探讨上，没有实际的收获，导致了广泛的失望。实际上，这酝酿着更加深刻的不满。

第二，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改革需要深化。青年政治热情的低落主要是政治信仰、信心和信任发生危机的产物。这种危机被社会各界清楚地感受到，党政领导人、教育工作者也再三提及，但能够化解青年不满的方法始终没有找到；青年也不被鼓励科学地认清中国现实，导致对国情的一知半解，反倒形成了强烈的反主流的行为倾向。于是，整个80年代，以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政治动荡连续不断，或以思潮冲击方式，或以游行示威方式，或以情绪发泄方式，而且每次动荡都与政治制度改革的波折有关。这便是80年代青年问题的政治层面，其制度背景是相当复杂的，有待于更加深入地进行科学分析。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 颖